

略论当代中国发展之道*

方松华 王蕊

[摘要]道,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为本原、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绕不开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的评价问题,两个30年本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涵,但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后30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包含了三个原创性突破: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原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解读中国不同于西方既定路径的中国道路与价值,必须探索中国文化之根与精神之源,探讨中国的崛起与中华古老传统文明之间的内在关联。同时,研究中国问题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只是为了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其最终的指向还应该是归依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并追寻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关键词]中国发展;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6)12-0001-07

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研究成为当下学界的热门,但是,研究中国问题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只是为了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其最终的指向还应该是归依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并追寻中国发展的价值与意义,就如先哲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历史之道

道,在中国文化与哲学中有多义,分别为本原、法则、方向、方法、真理、规律。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我们首先要感恩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思想解放和市场经济成就了我们的一代伟业。正是沧海桑田、斗转星移,1881年上半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将故乡友人捐赠的一台发电机在山东蓬莱文会馆内点亮了电灯,就此翻开了中国历史上电灯照明的新纪元,而135年以后的2016年,中国却将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出口到了英国;1876年,由英、美合作,携英国怡和洋行在中国修建了第一条营业性铁路上海吴淞铁路,而140年后,中国南车、北车完成合并,新成立的中国中车年销售额超越加拿大庞巴迪、德国西门子和法国阿尔斯通等欧美行业巨头,位居世

界第一。中车,体量上的“巨无霸”和技术上的领先者,正式登上全球舞台正中央,恰如目前的中国,经历近两百年的沉沦,当下中国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一个在30年前经济濒临崩溃的大国迅速崛起,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当代中国人以一个世代人的时光完成了西方近三四百年的宏大发展历程。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自被迫开启国门,直到八年抗战,最终“唤醒了酣睡的巨人”,所谓近代救亡与启蒙的主题由此而生。应该说,一个民族和国家在一个短暂时期的落后是极为正常之事。但是,我们还是要感恩“五四”时代,就像我们今天感恩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一样,因为正是“五四”将中国引入了现代。“五四”是中国学术与文化史上空前的大时代,她终结了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儒家传统,并使其不幸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她开创了现代中国的多元学术与文化时代,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她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同中国文化与革命相结合;她促成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两个世纪的沉沦与屈辱,重新昂首走向了世界的前列。正是“五四”的思想领袖和知识精英将“民主、科学、自由、人权、法制”等人类的基本价值带到了中国,他们是那个时代中国的杰出人物,他们作

* 本文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理论攻关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系研究”的中期成果。
作者:方松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蕊,上海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大的思想和不懈的努力使古老的中国走出了泥潭;其次,西学的输入,特别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文化从更加深厚的思想资源中吸取了人类精神的养料,在传统几乎断裂时重新获得了新生。新中国建立以后,历经艰难曲折,我们在不断的探索与反思中走向现代化、民族复兴与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实质上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历史。

探索中国发展之道,首先绕不开对两个30年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30年本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内涵,但作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明显可见的区别:特别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上,与前30年的计划经济、自我封闭、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相比,后30年所表现出的活力、开放和创造性无疑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后30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立实际上已破解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百年难题和中国发展的百年难题,比之GDP的数量和规模,更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是中国人用这一过程向世界和历史呈现了一种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般发展道路。

如果我们用改革开放30年来的巨大成就作反照,以分析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直观可见的就是前30年最后一段历史中表现出来的不堪回首的失误和失败,以及这种失误和失败在累积中形成的社会后果。美国经济学家科斯曾长久关注中国,他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国,社会凋零破败,经济支离破碎,政治迷惘失向,整个国家在曾经笃信不疑的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上艰难匍爬。人们曾经高昂的士气已经松懈,变为惰性、冷漠,和失望。”^{[1](p.31)}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观察,这些叙述并不完整,也不深刻,但却折射出真实的社会困境。而他所没有看到的则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已经开始了后30年改革开放的反思。因此用反思的态度认识前30年的失误和失败,重要的问题不只是追究什么地方没有做对,而是应该切切实实反思为什么没有做对。30多年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偏重于个人责任的历史解释,以及偏重于一个个事件的历史解释。个人责任和一个个事件都是理解历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要理解作为

一个历史时代的前30年,则个人责任和单个事件显然都是不够的。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于中国社会,而其起因则都与当时世界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都发生在中国周边,使中国人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反帝意识;而苏共二十大之后,我们与苏联的长期论战激生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反修意识,而后是阶级斗争的长期化,以及“四清”乃至“文化大革命”等都以“反帝反修”为起点和宗旨,当时的严峻世界局势影响了我们对国内环境的判断,成为国内前30年走向政治化和极左道路的重要诱因。另一方面,前30年的失误虽然发生在当代,但其中包含着近代中国人被外患逼迫而催生的急迫的民族心理的影响——康有为期许10年使中国富强是急迫;孙中山期许“毕其功于一役”是急迫,此后“五四”有急迫,10年内战有急迫,若以此观察“大跃进”时期的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同样会看到19世纪以来的“急迫”对20世纪的影响。之所以要从世界环境和历史传统的影响来认识前30年,是因为我们今天仍然生活在世界环境和历史影响之中。

其实,后30年的中国以拨乱反正为起点,并因此与前30年区别开来,因此,研究前后两个30年的重大区别,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后30年对前30年的原创性突破,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含了三个原创: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原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

第一,原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一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我们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既是对经典理论的重大创新,同时也是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状况和现实国情,经独立探索而形成的经济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是对市场经济本来形态的一种超越。从内涵上看,本义的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为主导要素的,由此形成的创造力和破坏性都非常明显。与之相因果的则是繁荣与危机常常相互依存。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再次表明,在以资本为主导原则的社会中,以资本为核心要素的市场经济是极其脆弱,甚至高度危险的。

市场经济虽有超常活力,但它并不是一个仅靠自己就能自我修复的均衡系统,如果缺乏某种强有力的非市场力量的规制和引导,市场体系很容易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让人类付出不堪承受的生态代价和人文代价,并在一定条件下陷入混乱,甚至导致崩溃。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仅仅是把市场经济与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结合起来,也不仅仅是要让一种合乎人性的社会价值去支配一个具有强劲自主逻辑的经济系统,在更深层次上,并因之而具有普遍价值的意义上,是要找到一条路径,使市场经济有可能避免严重失衡而持久地发挥功能。这些都说明,在由经济改革为前导,并以经济改革贯穿始终的后30年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既集中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也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经济的体制或制度体系,就是在改革中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着两大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在摆脱传统计划体制的同时继承国家在计划时代所拥有的对经济结构的深层配置能力;二是如何在建立全方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克服过剩、失衡和危机等难题,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公平公正分配。这也是当下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要解答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及其战略问题。

第二,原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社会主义将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条件交互作用的历史必然趋势而到来,这一必然性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个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它在取代中世纪封建制度之初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把它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在资本主义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力的巨大扩展,很快就达到了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的程度,从而产生了由一个更高的、以集体占有并运用生产资料为特征的社会取而代之的客观需要。与此同时,大工业又造就了一个人数不断增长、力量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它的客观生活条件迫使它不能不起来执行历史的要求,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直至最后结束资本主义的生命,建立起新社会。

我们看到,在马克思晚年关于东方社会的论述中,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的具体历史环境出发,侧重于俄国农村公社内外条件的有机结合,特别是强调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公社的内部结构,更新其内在机制而达到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来阐述自己对俄国乃至东方社会的性质及其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的看法,从而初步提出了落后国家社会发展的非西方非资本主义化的道路问题。“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启了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

但是,真正解决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原创理论则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它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尽管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我国的最大国情,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确立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和根本前提。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就是开启了新一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进程。在这一新的历史和理论进程中,最具创造性的理论成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丰富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表现,它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建制的创造性结合,历史性地突破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和传统体制的束缚,从根本上重构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内涵,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难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时代内涵。

可以说,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当然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崭新历史

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以及在当代中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所取得的历史和理论成就,不仅关系到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现实建构,同时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理论建构。所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化和时代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创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对应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面临的三方面重大挑战:一是教条主义和苏联模式的挑战;二是西学思潮,特别是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三是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是现代新儒家的挑战。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创新必须要回应这些挑战,并进一步论证开创一种以社会主义为社会形态的新型文明和社会类型的可能性。目前,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但远未完结,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提供光明的前景。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具体而切实地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下,中国从落后走向盛世的过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说服力,而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这种历史提供的说服力为依托,从理论上阐明我们正在建设的、立足于中国传统古老文明基础上的、既吸纳了现代西方先进文明的优秀成果又有着马克思主义伟大理想指引的现代中国文明。

总之,原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方面是说,作为人类文明的具体样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沿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渊源而来,而且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融为一体,并以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为解决全球共同的问题而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理路;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过程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理想主义的思想体系获得民族文化支持提供了范例。

二、价值之道

毋庸讳言,当代中国在经济突飞猛进的同时也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既有生态方面的,也有精神方面的。较之当下中国经济的艰难转型,精神和价值的重建则更为困难,它们之

所以成为当代中国极为紧迫的课题,是因为其不仅关乎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和安身立命之处,而且再一次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宏大命题。在经历了19世纪中叶以来170多年的苦难、沉沦和不屈不挠,不止不息的跌扑、奋斗、进取之后,当代中国开始在崛起中走向世界,并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世界。从历史的视角看,这一过程正前所未有地趋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所达到的庞大体量和已经形成的丰厚国力作比较,当下中国人在信仰上的目迷五色与价值观念上的各行其是,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散漫无序便不能不以其明显的反差和落差,构成了现代中国的重大矛盾。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反照,20世纪西方人大都认为:不用担心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强国,因为中国还没有强大的价值观念。近年以来怀抱恶意围堵中国的西方国家,他们用互相认同并拉拢别人来同中国对立的,仍然是所谓“相同的价值观”。前者说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后者说的是价值观的异同和价值观的对立。而两者又都说明了价值观问题不仅关乎一个国家国内的社会和政治,而且关乎一个国家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这两个方面,都是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所必须直接面对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价值观问题已越来越受到政界、学界和社会的自觉关注,常常成为政论和时论中的大题目,其间的中心和主干便是以24个字作表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目迷五色和各行其是之后,这是一种大幅度的廓清和明晰的导向。但重建价值观,对应的是成千上万人的内心世界。因此,就近年来的社会观察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进入人心、深入人心,并融汇于理想、信念和人生准则之中,其实仍然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这既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更多地思考探索,也需要我们把思考和探索化作更多的践履践行。

一个直观可见的事实是,在中国13亿多人口中,有8000多万的中共党员,近3亿的宗教徒。此外,除了主流意识形态外,至少还有八大形态各异的社会思潮。虽说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对于精神文明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关注从未停歇,但这些事实的存在又说明:新时期里

的社会变动、利益变动、生活方式变动,以及与之俱来的种种矛盾,已共同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格局,其中有新的思想重心、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社会关怀。而面对这种格局和呈现于这种格局里的种种问题,主流意识形态不能不“理一分殊”,以新的说服力形成新的回答。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最终要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价值,则不能仅仅功利地归之于彰显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其最终的指向应该是归依于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归依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只有归依于这种过程和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可能有现实的着落,而不至于成为一种凌空悬浮的东西。在这一方面,曾经在漫长的岁月里屡经起伏而稳定地维持了价值观念的历史中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保存了更多足资镜鉴的资源。本文开首所引宋代哲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段话,之所以能够成为儒学思想中的典范,就因为它所表达的信念切近社会,切近人生,而又能够在升华中显示出一种形而上的宏大。是以上承前人,下启来者,流传了近千年。作为对比,西方人的价值观念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宗教,而西方宗教以人的“原罪”作为起点,多用心于防止人性中的恶。但儒学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着眼点和用心处都在唤出人性中的善。传统中国文明的这种非宗教性,使儒家学说以伦理成就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与终极关怀。所以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辜鸿铭先生说中国是以儒学代宗教。中西之间的这种比较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各有一种历史形成的路径和走向,两者之间可以交汇,但很难彼此替代。而近代中国留给我们最大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因西潮灌入而催发出的文化激进主义,一面大幅度反传统,一面大幅度引入西学。前者包括了中国人的价值,后者包括了西方人的价值。但最终的结果是传统的价值在冲击下破碎,而西方的价值又无法在中国立得起来。追溯远因,今日中国价值的困局未必与此没有渊源。

在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里,种种艰难曲折和灿烂辉煌留给我们最富指导意义的思想之一是“独立自主”。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又向世界学习,而产

生于这一个过程起始之日,并始终贯穿于这个过程之中的主要命题之一的“摸着石头过河”,同样内含“独立自主”的意识。中国人的“河”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过。因此借鉴不能成为替代。正是以这种自觉不移的自主精神为导向,中国人才可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又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既定路径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就一方面来说,这种道路或模式已经举世瞩目,就另一方面来说,这种道路模式还在进行过程之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都在于它是这个过程里的重要部分。作为植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它只能以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一百多年的新文化传统和九十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为背景,自主地形成自己的理论解释和实践取向,而不能自归于从西方世界发源的普世价值。而作为一个仍在进行之中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然会不断地面对问题,并因此而需要不断地解决问题。

三、文明之道

要解读中国道路与价值,必须探索中国文化之根与精神之源,即要明白我们从何而来,回溯中华民族之源头、命脉及其传承。中国道路的研究不仅需要理论的思考,更需要当下实践的探索与历史经验的追寻。中国的崛起,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深刻的文化与精神因素,或者说,中国的崛起与中华古老文明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内在关联,这是中国道路研究亟需探讨的问题。

如果按照数据来分析,当代中国仍然属于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但她其实并非是从“一穷二白”中崛起的,她更不是一个新兴的暴发户。五千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使她底蕴深厚。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相继生发,并且在漫长的岁月里超稳定地发展,成为古老文明的不朽瑰宝之一,其中强大的决定因素在于中国文化本身。无论是与人类文明兴起时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相比,还是与后来其他兴起的文明发祥地古希腊罗马、甚至近代崛起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国文化与文明一直以其独特的方式发展着,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7、18世纪以前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

的国家之一。当世界上不少古文明相继衰亡以后,她却生生不息,那么,这个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的文明的灵魂又是什么呢?

自先秦起中国文化学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始了思潮激荡、精神高昂、流派纷呈的子学时代,诸多原创的思想都产生于那个时期。西汉学者刘歆作《七略》,其中《诸子略》将先秦和汉初诸子学派分为10家,即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家,并分别指出其学术渊源及主要特点。10家中小说家属于艺文,除去则称为九流,此所谓九流十家。诸子百家贡献了中国学术文化不朽的经典,为我们存留了无数的经、史、子、集,它们共同的思想源头是《周易》。从先秦起,中国学术思潮历经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一直到现代的多元学术思潮,中国传统文明的灵魂即是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家与佛学以及其他诸子百家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儒家讲仁义与礼制,道家追求自然与无为,禅宗崇尚顿悟与超越。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尤其是它的官僚体系、科举制度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国哲学所追求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与生活态度。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都纳入道德人伦之中,纲纪伦常和礼仪规范铸成了传统文化的中心,儒家经典则是这个中心的理论形态。而中国文化关心的终极问题,也就是如何成德、如何成就人品的问题。比较世界各文明的发展,辜鸿铭先生曾经说过:“要估价一种文明,不是看它是否修建了和能够修建巨大的城市、宏伟的建筑与宽阔的马路,也不是看它是否制造了和能够制造精致实用的工具,甚至不是学院的建立、艺术的创造和科学的发明,而是看它能够造就什么样的人。”^{[2](p.3)}中国人在古代世界里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领先地位,并且超稳定地发展,其关键就在于中华文明的这种特性本身。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明其实是一种中道、中和的文明,与人类其他文明相比较,“和”的智慧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无论是人与自然、人与人,还是人与自身、人与世界,“和实生

物、同则不继”。中国“和”的思想与智慧垂之久远,对于人类文明曾经并还将继续起到一种极为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文明绝非凭空产生,它是从一种巨大的文明规模中——以一个适合农耕的巨大陆地板块和悠久的历史连续性为前提条件创生的。历史地看,中国文明有着深厚的和平主义品性,它以一种独特的自信昭示着深厚的文明能量。在中国文明中,与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相辅相成的是它的文官体制(尤其是后来的科举制度),这是导致中国两千多年来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另一个重大原因。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是以先秦的儒、墨、道、法为其主体的。一般认为,历代的统治者表面上采用儒家的思想,实际上是实行法家的主张,此所谓“阳儒阴法”的方法,由此也表明,儒法两家的政治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主流。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都有比较完备的政府组织系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官僚政治。其中在汉、唐、宋、元时期曾经有相当的分权制度,但是总体来说,皇帝独裁和君主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特征,与这种独裁的(家天下)、专制的(人治)统治互为补充的是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中国的宗法制度,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氏族社会,这种建立在父权家长制基础上的宗法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的政治结构和宗法制度铸成了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成为影响中国文化与社会发展的根本特色所在,既成就了中国两千多年持续超稳定的繁荣发展,又不幸成为近代中国近两百年沉沦的根本原因。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带来的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历经康乾盛世,维持到乾隆末年。其时,中国的经济总量仍占世界的第一位,人口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由于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以来一直是东亚国家和民族中最先进的,文明发展程度在所知世界范围内无可匹敌,古代中国人的自我中心意识特别强烈,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华夷”观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方式和准则。然而,此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却正面临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从英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工业化革命浪潮,资本主义

的工业化浪潮使工业生产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繁荣。这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277)}

“五四”新文化运动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传统,并使其成了博物馆的陈列品;她提出了“重新估计一切价值,再造文明”的宏大时代课题;她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到中国,创造性地与中国文化与革命相结合;她促使中国文化与文明的转型,60多年共和国的不平凡历程为中国道路奠定了基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最终使中国摆脱了近两个世纪的沉沦与屈辱,重新昂首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因此,中国崛起的背后决不仅仅是简单的中国古老传统文明的复兴,而是融摄了现代人类诸多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果,其中更有马克思的伟大理想。

探索当代中国发展之道,我们认为,当下和未来最紧迫的课题,是继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要建构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一方面试图打通中国的社会主义(前30年)和特色社会主义(后30年),这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中可以明确看出。如此,无论是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还是邓小平讲的到2020年前后我们的制度将要定型,对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都是一个伟大的贡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是要建构一个“新道统”,构建一个创新的意识形态,其内含“新政治体”、“新经济体”和“新文明体”,旨在建构中国现代文明和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问题之所以极为重要,可以说是关乎中国的未来向何处去的时代课题。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和担当,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那将是功德无量,因为当下中国实

在需要建构起像儒家那样引领中国2000多年超稳定繁荣与发展的思想与文明。

国家治理在中国和西方有着比较大的差别。传统中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虽然有时表现为“阳儒阴法”,但是追求“王道”和“仁政”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共同理想。近代以来,孙中山试图模仿西方,建立现代国家,但是没有成功,毛泽东1945年在延安与黄炎培和梁漱溟彻夜长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走出历史兴衰周期律的道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p.611)}可惜新中国成立的前30年历经坎坷。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崛起,理论和制度的解释力仍然比较薄弱,所以才有“左右之争”,各种思潮纷呈。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原创的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则将提出的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或者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一个关乎民族复兴、现代化、社会主义和中国现代文明的宏大叙事与目标。因此,核心的问题是:在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创建了新中国以后(前30年),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迅猛崛起,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和使命将是如何治理国家,将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参考文献]

- [1] [美] 罗纳德·哈里·科斯, 王宁. 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 徐尧, 李哲民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 [2] 辜鸿铭. 中国人的精神[M]. 黄兴涛, 宋小庆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4]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美 景

On the "Tao" of Developme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Tao" carries various meaning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 including root, principle, direction, means, truth and rule. To develop the Tao of development for contemporary China can not avoid the assessment of the 30 yea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two 30 years essentially came down in one continuous line in historical sense while the differences are evident. Socialist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latter 30 years are composed of three original breakthroughs: original theory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original theory of socialism at its primary stage and innovation in localized Marxism. To interpret Chinese road and value different from established western pathway, we must explore the root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ource of its spirit, and discus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ise of China and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Meanwhile, studying Chinese issues allows no eagerness for quick success and easy profits, or for sheer manifest of Chinese culture as its soft power. The ultimate goal of researches shall be brought dow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in pursuit of value and significance for its development. (Fang Song-hua and Wang Rui)

On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in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ts New Scenes and missions: The fundamental philosophy in modern political Party governance demonstrates that a mature political party imposes a heavy weight o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CPC has long considered the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s an effective weapon for long existence and strong development since its foundation. The new age witnessed the new pattern of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featured by unwaveringly sticking to ideal and faith, organic integr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Party governance and serious inner Party political life under the strategy of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Plagued with the circumstances with complicated conflicts of interests and multiple values, it becomes a new mission to for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to guide CPC members into holding fast to ideal and faith, excluding the disturbance of mistaken ideologies, maintaining the ideological stance, and fostering CPC members to more voluntarily take on its political mission. However, a series of challenges regarding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came along, represented by the issue of responses to the reality and that of overcoming the "last mile" for ideological theory. To break down the plights in the Party's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four realistic issues, including the initiative agreement with the epoch demands for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holding on to "reality-based" position, positive response to marked issues in ide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adherent co-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with institutional Party construction. (Chen Peng)

On the Necessity of Progressively Building up a Social Ecology for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part of straightening out political life within the Party and strengthening up the Party construction. Taken from a social ecology perception, the ruling Party construction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a social ecological system or the principle that the Party exercises self-discipline and is strict with its members, is rather profoundly directed by the flow and change of certain social ecological factors including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than an independently isolated political ac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deeply analyze the major topics of and challenges to administering the Party with strict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for gradually building up a social ecology compatible with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and an early fulfillment of the China Dream to revitalize the great rise of the nation. (Ai He)

The Ten Pair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 in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On Xi Jinping's New Statement and the New Demands of Central CPC: Proposed by CPC at a new historical stage of the China Dream of revitalizing the nation,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serves as the fundamental policy and basic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construction in response to challenges of political ruling and developmen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Eighteen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put forward a systematically strategic layout on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The ten pair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 in the concepts, mechanism, methods and strategies for Party construction mirrored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eat project of Party construction by the Central CPC with Xi Jinping as its top leadership. The ten pairs of dialectical relations in comprehensively enforcing strict Party discipline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of guarding the Central CPC's authority and fully upholding inner-Party democracy, of respecting rule for governance and guarding the value of majority of the Party, of keeping the Party's advancement and integrity and enhancing ruling capability, of ideological Party construction and institutional Party governance, and of fully developing the guidance and focusing on strictness. Other dialectical relations are the dialectical unification inheriting and innovating, of drawing from other political parties' experience and reflecting on our Party's experiences, of rigid punishment and mild caring, of strictly executing disciplines and safeguarding supervision, and of observing the constitution as well as other laws and complying with inner-Party regulations. (Yao Dong)

The New Concept, New Ideology and New Strategy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f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ircles studied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macroscopic wholeness, microscopic multi-dimension and mutual relations. The studies of macroscopic wholeness take Xi Jinping'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as an entity and develop from the aspects of theoretical source, systematic matters, stylistic features and significance. Those of microscopic multi-dimension conduct multi-dimensional analyses of the sub-systems of his thoughts o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lassified studies of the new thoughts, concepts and statements accomplished in Xi's governance of the Party, the nation, the army, and the society. The third kind develops on the basis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ormer two types. (Wang Xian-qing and Yang Xiao-juan)

Latest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with Xi Jin-ping as its top leadership, has been developing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Great importance is attached to the epoch value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while promoting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s regarded as the core value of state governance. We should fully grasp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elaborate a system of fair right, opportunity and rule, and highlight the sharing of development benefits by all people. We should also take the new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consideration to further clarify the fundamental lines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and pay attention to its implementation demands with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Huang You-zhang)

On the Discours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ts History, Reflection and Implic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has experienced the shift from sheer domination to diminished discourse. Fundamental causes for the descending discourse lie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dvancement of market economy practice and lagged researches on political economy theory, biased stress on keeping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mistaken decision making by related departments. It is accordingly suggested that we are in pressing need of "building up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basis to rebuild Marxism political economy discourse. (Wang Chao-ke and Mao Pei-hua)

Thoughts on the Challenges to Marxist Religious Ideas: Marxist religious ideas have been confronted with challenges in current China. Marxism religious ideas have been challenged in faith, social practice and educational publicity by the education of Marxism religious ideas, current CPC cadres' lack of faith in Marxism, the diversity of social faith and values, the increasing social contradictions, expanding influence of ethnic religion and culture, incremental psychological issue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To firm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religious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us work calls for positive promotion of full knowledge of Marxism religious ideas and their application. (Wang